

中国农村农业和非农业增长与区域差距^{*}

彭 玉 生

内容提要:关于改革以来中国地区间的不平等是加剧了还是减缓了的问题,学术界争论不休。本文用1985—1991年间县级有关资料,分析了农业与非农业发展对区域间不平等的影响。分析表明:中国县域间非农业发展较之农业发展更显不平衡。因在农村总产值中非农业份额日益增长,导致农村基尼系数不断上升。分析发现,农业增长呈现绝对趋同的趋势,而非农业增长则呈发散趋势。非农业部门的发散趋势可由其对城市经济的依托和对人力资本的依赖得到解释。在农村就业不足的推动下,非农业与农业显示互利作用,因此,农业不平等与非农业不平等互相强化。

引 言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农村工业化作为增加农民收入和创造就业机会的一种替代战略而得到大力推广。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低的国家中,农村工业对于减缓农村失业、解决贫困问题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过去十多年里,中国农村工业的飞速增长大大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经济面貌。农村工业崛起之前,农业是农村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影响农村不平衡发展和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当非农产业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时,也成为导致区域差异的重要因素。本文考察方兴未艾的非农业部门在1985—1991年间对中国县级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

始于1978年的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似乎印证了制度理论。1978—1983年间实施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通过土地承包把基本生产核算单位由生产队一级转变到了农户,结束了历时近30年的集体农业制度。农户有了经营自己承包地的权利和自由支配剩余收入的权利,尽管由于土地在法律上归集体所有,农户不能出售土地。财产关系的变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繁荣。图1表现了1984—1995年间农业和农村企业总产值的变化情况。在11年里,农业生产保持了5.8%的(实)增长率。

生产责任制的实施对传统农业的效用如同一次性强心剂。虽然政府在1978—1980年、1987—1989年间两次提高农产品价格,但提价并不能从长远改变农业经营利润低下的状况(国家统计局,1996,第255页)。在土地短缺的条件下,农业投资的边际回报和劳动生产率都趋于下降。农业产值的持续增长主要是通过技术革新带来的,例如采用杂交水稻技术,或发展渔林牧业多样化(Huang and Rozelle, 1996)。

* 本项研究得到香港中文大学“新教员奖励基金”和“南中国计划”的资助。作者受惠于李沛良、成露茜、王绍光、李宏毅、林辉、威廉·帕瑞斯(William Parish)、莱茵·祖克尔(Lynne Zucker)和米歇尔·德比(Michael Darby)的评论与帮助。我特别要感谢党国印先生为本文中文文稿所做的大量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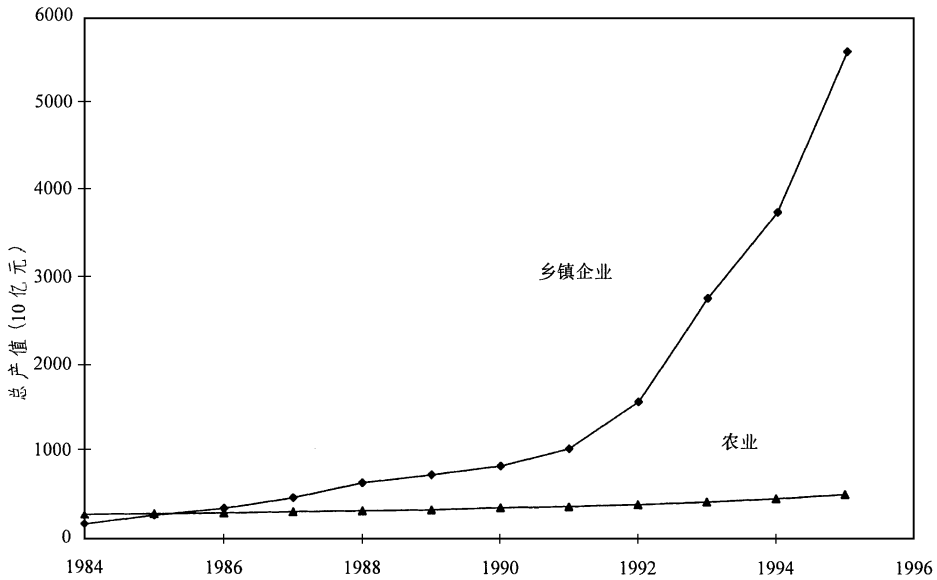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 1984—1995 年农业与农村企业总产值(1980 年不变价格)

资料来源: 1.《中国乡镇企业年鉴》1993—1996 年各卷。 2.《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7 年卷。

中国经济改革最切实的成就是农村非农产业部门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崛起。^① 归因于地方公司主义的制度安排(Walder, 1995)或者杂交组织形式(Nee, 1992; Nee and Su, 1996), 乡镇企业的业绩大大超过了国有企业。农村地区的灰色市场环境也使得乡镇企业从城市扩张和城市经济溢出中获取很大好处(Naughton, 1995a), 这一点后文将详尽讨论。

根据图 1, 在 1984—1991 年间乡镇企业总产值平均年(实)增长率至少不低于 20%。90 年代的增长率更高。1987 年, 它在农村产值中的份额超过了农业所占份额(中国农业银行, 1993)。^② 按增加值计, 农业部门 1995 年大约达到 12000 亿元, 为 GDP 的 23%; 同年乡镇企业则大约达到 14600 亿元, 占 GDP 的 26%(国家统计局, 根据 1996 年资料计算, 第 42、390 页)。因此, 农村工业被看作中国经济增长和利润的新中心(Naughton, 1995a; Li and Wang, 1993)。

中国农村经济分化为农业和非农业部门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978 年农村经济改革前夕, 农村非农就业占农村总劳动力的比重不足 10%(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1997 年, 第 28 页)。这个数字不仅低于国际标准, 亦低于中国 1949 年前的水平。其它亚洲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 有相当高的非农业经济活动(Blank and Parish, 1990; Ho, 1994)。传统的中国农村经济在工商业方面有较高的分化和发展(Ho, 1994; Zhang, 1991)。与国家在农村经济的高度控制同步的农业集体化实际上抑制了农村的工业化(Naughton, 1995a, p. 145; Fei, 1989)。虽然国家对农村工业活动的限制在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有所放松, 但直到 1984 年农村工业只是作为农业的附属, 而不是一种替代发展战略(Ho, 1994; Wong, 1988)。在 80 年代初期, 决策部门还就乡村工

① 根据本项研究所利用的县级统计资料, 93%的非农业总产值是由乡镇企业创造的。人均非农业产值与人均乡镇企业产值的对数相关系数是 0.887。

② 依 1980 年不变价计算, 图 1 显示, 非农业产值在 1986 年提早一年超过了农业产值。国家统计局 1995 年开始报告净产值。按照官方定义, 社会总产值是指农业、工业、邮电和运输业以及商业(包括饮食业, 但不包括金融和法律服务业)。

业的增长是否“盲目”以及它与农业争夺资源(土地、资本和劳动)、挤占国有企业的市场等问题争论不休。直到1984年后政府才承认和支持乡村工业的发展并允许城市技术下乡(Wong, 1988, pp. 9-11; Ho, 1994, pp. 23-27)。到1996年,农村非农产业的就业人数占到了农村总劳动力的34%(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1997, 第28页)。黄宗智(Huang, 1990, pp. 244-246)指出,在改革期间中国农村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逆转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的产量增而劳动生产率和收入降的增长格局,并第一次带来真正革命性的转变。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这个革命性的变化对区域差别有什么影响?从横切面来看,非农产业的地区分布是什么状态?它与农业发展在布局上有什么关系?从纵向观察,农村工业的集中与分散的决定机制是什么?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前,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有关文献。

文献回顾

对区域收入差异的研究出于两种理论传统。一种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这个模型预测较落后地区和较发达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会趋同于一稳定状态。基于资本回报递减的假设,索洛-斯旺模型预测,落后经济,即资本-劳动比率较低的经济,资本回报率较高,因而也产生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罗默(Romer, 1986)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如果增长容纳人力资本和技术扩散,则资本回报递减假设并不成立。若以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扩散为前提条件,落后与发达经济仍可趋同。在新古典经济模型中,要素流动至关重要。劳动者为追求高工资从贫穷地区流向富裕地区,资本为追寻高回报率由富裕地区流向贫穷地区,因而加快趋同过程。索洛-斯旺模型引发了大量关于地区间和国家间收入差异的经验研究。增长模型中的趋同性可以由初始水平的人均GDP或人均收入对增长率的负的回归系数得到反映,因而亦被称为 β -趋同。例如,巴罗与马丁(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5, pp. 11-12)证明美国各州与日本各县人均收入呈趋同增长。

另一种理论以库兹涅茨假说为核心,这种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二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倒U型曲线: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收入差距会扩大;而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收入差距会缩小。库兹涅茨分析的主要依据,是工业化过程中人口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非农业部门转移。其逻辑很简单:假设现代非农业部门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与传统部门相比可以产生较高的收入,当非农业人口由少数变成多数时,收入差异的倒U型曲线就成了数学上的必然结论。尼尔森(Nielson, 1994)以及尼尔森与阿尔德孙(Nielson and Alderson, 1995)的研究表明,收入差异与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主要由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收入差异对基尼系数的正效果和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对基尼系数的负效果来决定。尽管库兹涅茨假说本来只涉及个人收入的不平等。但倒U曲线已经被广泛用来描述地区和国家之间人均收入的差异。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65)发现,伴随经济发展,国家内部地区间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也表现了倒U曲线。不过这个曲线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并不像个人收入差异倒U曲线那样清楚。

从概念上讲,增长模型中的 β -趋同指贫穷经济以更快的速度赶上富裕经济这一趋势。如果没有新的干扰, β -趋同将会缩小横切面上的收入差异。增长模型提供收入差异的纵向动态分析。库兹涅茨则强调了农业与非农业二元机制的重要性。

关于中国区域差别的研究也遵循了这两种理论传统,环绕的中心问题是1978年以来经济改革与市场化是增强或减缓区域间收入差距。翦天伦、萨克斯和瓦尔纳(Jian, Sachs and Warner, 1996),以及陈和费莱希尔(Chen and Fleisher, 1996)分析了省际资料的增长模型,发现

省级经济在改革前呈发散,而在改革后的80年代呈趋同。尽管沿海省份和内陆省份的差别在90年代开始扩大,但沿海省之间和内陆省之间的趋同趋势并未停顿。翦天伦、萨克斯和瓦尔纳(1996, p. 12)把趋同趋势归因于原农业省有大批乡镇企业进军轻工业、建筑业和服务。

中国经济在地域上的差别包括三部分:城乡差别、农村间的差别和城市间的差别。崔启源(Tsui, 1993, p. 617)分析1982年县市资料发现,按人均工农业总产值计算Theil指数的构成,城乡差别为52%,农村间差别为40%,而城市间差别为8%。既然城乡差别巨大,如果不把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分开,估计区域差异就有缺陷。蔡(Cai, 1994)对省级数据的分析表明,即使1967—1989年间总的基尼系数呈倒U型,从7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农村人均GDP基尼系数在整个80年代还是上升的。罗泽勒(Rozelle, 1994)发现,1983—1988年间江苏省县际基尼系数有显著上升,原因是农村工业的基尼系数很高而其在整个农村经济中的比例迅速扩大。

本文不以省为分析单位,亦不局限于分析一个省内部的差异,而是分析25个省的详细的县资料。综合强调动态过程的增长模型和强调二元结构的库兹涅茨收入分析,本文比较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增长机制,并分解其各自在中国农村区域差异中的贡献。

农业和非农业增长率的决定因素

非农业部门与农业部门有完全不同的增长机制。中国农业的投资回报递减为众所周知,并根据索洛-斯旺模型的预测应该有一个趋同性增长趋势。但乡镇企业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特征,使其进入发散型增长的轨道。首先,乡镇企业有赖于城市经济辐射,特别是技术辐射,因而聚集大城市周围。第二,乡镇企业受惠于人力资本的推动。虽然多数乡镇企业是劳动密集型的,而不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反映了中国廉价劳动力供应的比较优势(Lin, Cai and Li, 1996, pp. 179—181),但非农业部门的增长比农业部门更依赖教育。下面详细考察农业和非农业增长与城市距离、人力资本及农村失业的关系。

城市距离。乡村工业在改革期间的崛起与城市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密不可分。诺顿(Naughton, 1995b)和帕金斯(Perkins, 1990)指出,乡村工业紧紧环绕城市而发展,并非散落在广大农村。很大程度上,农村工业化实际上是市郊工业化。与亚洲其他国家很相似,环绕城市中心地带的“城市化农村”呈现出工厂与农田错落有致的景观。彭玉生、祖克尔和德比(1997)把乡镇企业对城市的依托主要归结为技术人员由城市向近郊转移所导致的技术溢出。^①在交通可及的半径内,大量技术管理人员(包括兼业者和退休人员)转到了快速发展的乡镇企业,既享受市场体系的高工资收入,又不至于丢失配偶所在城市的国有单位提供的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等福利(Li and Wang, 1993, pp. 122—131)。估计在90年代早期约有300万城市人在乡镇企业任职(China Daily, 2, 9, 1993)。^②

但对农业来说,地处市郊可能弊多利少。城市的工业知识对传统农业几乎没有什么用处。城市扩张提高土地价格和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这样对农业产生的负作用可能抵销了蔬菜种植、禽畜养殖和渔业因接近城市市场而得到的好处。

① 一份中国专家调查报告称:73%的专家认为乡镇企业的技术主要来自城市工业企业,18%的专家则认为主要来自大学和研究机构,没有人认为乡镇企业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技术(Liu, 1995, p. 201)。

② 劳顿(Naughton, 1995b, pp. 82—83)分析说,城市邻近效果不仅来自城市居民流动产生的技术溢出,还与国有企业为利用廉价土地、廉价劳动以及农村地区政府控制相对薄弱的环境,便于实现业务扩张有关。丘海雄(Qiu, 1997)注意到,国有企业的经理经常与乡镇企业开展业务合作,并使之成为把公家财产装入个人腰包的一个途径,这与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形有惊人的相似(Stark, 1996)。90年代乡镇企业蒸蒸日上,而国有企业利润直线下降,不完全是巧合。城市向农村究竟溢出了什么东西需要另文分析。

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因提高吸收技术的能力而与经济增长有密切相关。贝克尔(Becker, 1964, p. 25)强调,人力资本主要通过技术进步而推动经济发展。许多研究者(例如:Ho, 1994; Sengupta and Lin, 1993)指出,教育对于中国乡村工业发展具有极端重要性。农村企业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借助管理和生产技术进行竞争的结果。正规学校教育孕育企业家和管理人才,帮助农民获得工业技能和专业技术。另一方面,小规模家庭经营限制了中国农业的技术更新,因而教育在农业增长中不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紧缺和农村劳动力剩余。何(Ho, 1994, p. 60)指出,土地短缺和乡村劳动力过剩是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土地与劳动供应量之比对农村工业和农业有截然不同的影响。土地和劳动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投入因素。如果有足够的土地,劳动投入的增长将直接导致产量的增长。但如果土地短缺,且其他因素不变,劳动投入的增长将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因此,土地短缺将促成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

中国农村的人地矛盾十分尖锐。在1949—1989年的40年里,中国人口由5.4亿增长到11亿,翻了两番。虽然中国政府在40年里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但她的国有企业部门走上了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发展模式,而不是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发展模式,因此不能有效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Lin, Cai and Li, 1996)。中国农村劳动力(没有城市户口)的总量1991年达到4.78亿,1996年达到4.9亿,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已超过70%(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7,第9页)。^①就全国来讲,平均每个农民只有3亩(半英亩)土地。据陆学艺(Lu, 1993, p. 236)估计,据中国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计,农业部门需要的劳动力不超过1.5亿。因此,在官方所界定的农民中,超过2/3的是剩余劳动力需要转向非农业部门。在集体经济时代,“以粮为纲”政策把农民束缚在了有限的土地上(Huang, 1990; Lu, 1995)。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困于“无进化增长模式”中,即在边际生产力递减的情况下单靠增加劳动投入取得经济增长(Huang, 1990)。集体农业的解散暴露并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把他们转变成了潜在的雇佣劳动力。因而有大批农民涌进城市寻找临时工作,或在服务业从事个体经营(Cheng and Selden, 1994; Wu, 1994)。但这些流动人口没有城市户口,不能融入城市生活(Solinger, 1995)。国家政策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

乡村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农业积累因提供消费品市场和建立乡镇企业的初始投资而支持了乡村工业化(Anderson and Leiserson, 1980)。在形成乡镇企业初始资本投资时的农业储蓄所发挥的作用已得到充分考察(Ho, 1994, p. 60; Byrd and Gelb, 1990, p. 364; Wang, 1990, pp. 222—223; Peng, 1995)。尽管在发达地区非农业储蓄已经超过了农业储蓄,后者在乡镇企业的发展初期的作用十分关键。农业储蓄转化为乡镇企业的投资主要通过两个渠道来实现:私人储蓄和地方金融机构。新的私人企业倾向于从私人储蓄中筹集资金,因为他们在获取银行贷款时受到歧视。村办和乡办企业可以从那里集资,有时把集资缴款作为进入企业就业的一个条件。

乡镇企业如何影响农业发展,学术界颇有争论。一方面,根据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条例(中国乡镇企业年鉴,1997,第85页),乡镇企业有义务给农业提供补贴。事实上,乡镇企业的一小部分利润的确投进了农业:这个数值在全国1990年是77.8亿元(约占总利润

^① 关于城市与乡村劳动力或“居民”的官方区别并非城乡居民的自然区别。这种区别实际上是涉及“商品粮”和其他特权的行政分类。例如,一些乡政府干部有城市户口是因为他们吃“商品粮”。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农村打工者进入城市而没有城市户籍,他们在新出现的自由市场上买粮吃(Lu, 1995; Solinger, 1995)。

的13%),1991年是86.5亿元(约占12.6%),1992年是105亿元(约占10%)(中国农业银行,1993,第336页)。农村工业化还通过农业和非农业工资收入的再分配而帮助了农业。例如,在集体经济仍很大的苏南一些乡村,农业和非农业的工资报酬是一样的,这成了一种隐蔽的农业补贴(Wang et al 1995, p. 50)。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对农业的影响作用可能是消极的。首先,建立乡镇企业占用甚至滥用了农田。由于集镇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建立,以及建造私人住房,中国的可耕地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少(Orleans, 1992; Lu, 1995)。其次,对劳作辛苦而收入微薄的农业生产活动,乡镇企业提供了一种替代。在比较发达地区,农民找到了非农业工作,便抛荒了肥沃的农田(Lu, 1995)。如果农业和非农业工作的报酬存在差距,农民就会从农业生产转向乡镇企业。

东部沿海地区。中国沿海和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受到广泛关注(Jian, Sachs and Warner, 1996; Chen and Fleisher, 1996; Yang and Wei, 1996)。翦天伦、萨克斯和瓦尔纳(1996)指出,90年代沿海和内地各省之间的人均GDP的增长趋势是发散的,而沿海地区内部和内陆地区内部的经济增长趋势是趋同的。一个被人们广泛使用的“梯度”理论把中国经济划分为三个台阶: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高原地区,相应地在经济上是发达、中等发达和不发达地区(Wang et al, 1995)。是什么特别因素导致沿海经济增长更快,人们的答案很不一致。一些外在因素可能包括沿海“开放”城市与世界市场接近(Fan, 1992),以及政府的政策倾斜(Yang and Wei, 1996)。

东北三省作为中国粮仓而著名。新疆以养畜业发达而产生了很高的人均农业产值。乡村工业在中国极不协调地集中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1995年,这些地区以其占中国农村约1/6的劳动力,创造了超过中国乡镇企业产值1/3的业绩(国家统计局,根据1996年资料计算,第345、389页)。

假 说

现在,我把上述分析概括为关于区域差距的动因与趋势的三种假说。假说1和假说2涉及增长的动态分析。假说3是有关产值的横向分布。

假说1: 农业增长与非农业增长有不同的动因。非农业(主要是乡镇企业)增长依赖城市工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能,其中城市居民的技术传播和地方人力资本起极为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城市工业技术几乎与农业不相关,城市扩张对农业增长有消极作用。小规模农户经营限制了技术的运用,也限制了教育在农业增长中的作用。

假说2: 所以,农业增长呈现出趋同趋势,而非农业增长则呈现发散趋势。因为资本投入在农业生产中的边际报酬递减。索洛-斯旺模型所预测的绝对趋同性可以成立。另一方面,非农业部门增长得益于知识溢出和人力资本,所以,新增长理论预测的有条件趋同应该成立。

假说3: 非农业生产的地理分布比农业生产的地理分布更不平衡。因此,随着非农业部门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日益扩大,中国农村总的地区经济差异应随之扩大。

资料与变量

科乃和宋(Knigh and Song, 1993)认为,中国的县很像一个小王国,是理想的分析单位。中国有2300多个县和县级市。1991年,平均每个县的人口规模为474000人。最大县的人口略超过2百万,而最小县只有7500人。

本文所用县级资料有四个来源:(一)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为评价小康县而进行的一项对 1991 年县级社会经济状况的联合调查(1992)。(二)《中国分县农村经济统计概要》提供的产量历史资料(国家统计局 1989, 1991, 1993)。(三)《中国县情大全》1—6 卷提供的地理分布资料(民政部, 1992)。(四)《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 1992)、陈和王(Chen and Wang, 1991)提供的 195 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地理分布资料(包括香港与澳门)。有关城市的资料用来估计县与城市的距离。

1992 年的小康县调查收集了 24 个省区(未包括辽宁、海南和西藏)、3 个直辖市和 2044 个县(包括县级市)1991 年的情况。因为资料的质量问题,我从两个省区(内蒙古和青海)剔除了 123 个县;又因为缺值、殓值或数据矛盾,剔除了另外 38 个县。最后有 1883 个县用于分析。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下述每一个变量或者取自 1991 年小康县调查资料,或者取自《中国分县农村经济统计概要》1980—1987 年卷、1989 年卷提供的 1985、1987 和 1989 年的资料。

农村人口是样本县农村户籍居民的年末人口总数(没有包括城市户籍居民)。所以“人均”值据此计算。

农业产值指在一个县里种植业、林业、畜禽业、渔业和农户家庭副业(狩猎、采集和家庭手工业)各方面产值的总和。

非农业产值是指一个县里个体农户和企业(在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各方面产值的总和)。从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减去农业产值得出了这个数值。

土地与农村户籍劳动力之比是指以亩为单位的农地总量(国家统计局, 1993)除以(被调查的小康县的)农村总劳动力。农村总劳动力包括了样本县农村户籍的劳动力,但没有包括在县域以外工作和生活的人,还排除了县域里那些没有当地户口的人。

人力资本供应根据县域内有初中或与之相同学历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计量。彭(Peng, 1992)和杰尔伯(Gelb, 1990)的研究报告表明,在乡镇企业的雇员中,初中教育带来的回报最高。

城市距离指标是根据斯特渥德和瓦尔茨(Steward and Warntz, 1985)的公式,通过计算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省地级以上城市的人口/距离比数的总和而得到的。距离是每一个县到 195 个大城市中每一个城市的孤距离,计算依据标准公式(Robinson et al, 1995, p. 50)。县域的地理坐标依据《中国县情大全》1—6 卷,城市的地理坐标则依据陈和王提供的资料。城市居民只包括城市户籍居民,数据出自《1992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 1992)。这个指数通过减去平均数、除以标准差而得以标准化。^①

沿海地区按官方定义包括黑龙江、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和天津三个直辖市。

增长分析

为了估算人均农业产值和人均非农业产值的趋同性或发散性,我采纳巴罗和马丁(1995, pp. 387—388)的方法,估计了下列基本增长模型。

$$(1/T) \cdot \log(y_T/y_0) = \alpha - [(1 - e^{-\beta T})/T] \cdot \log(y_0) + \gamma X + \epsilon, \quad (1)$$

其中起始年度(1985) $\log(y_0)$ 的人均总产值是一个关键的自变量, X 是一个辅助变量集,影响

^① 关于这个变量,我要感谢威廉·帕瑞斯提供的建议和参考资料。

常稳态的位置和技术水平等。 $[(1 - e^{\beta T}) / T]$ 是初始产值的回归系数, β 是趋同率, T 是年数。若该回归系数为负值且具显著性, 则代表趋同, 即落后县增长速度高于富裕县。通过控制辅助变量诸如沿海地区、城市距离、教育等因素, 可以检验条件趋同。我总共运用了 4 对 8 个回归方程。每对回归方程同时估算, 允许其残项相互关联。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农村人均农业和非农业产值(对数)年均增长率的回归模型(1985—1991) N=1883 县

	农业 (1)	非农业 (2)	农业 (3)	非农业 (4)	农业 (5)	非农业 (6)	农业 (7)	非农业 (8)
常项	0.187 *** (11.4)	0.181 *** (16.8)	0.230 *** (14.1)	0.188 *** (17.4)	0.240 *** (15.0)	0.314 *** (26.1)	0.222 *** (13.8)	0.181 *** (6.43)
1985 年人均农业产值对数(-4.39)	-0.012 ***		-0.020 *** (-7.42)		-0.027 *** (9.58)		-0.030 *** (-9.88)	0.029 *** (5.47)
1985 年人均非农业产值对数		0.002 (1.11)		-0.002 (-0.83)		-0.043 *** (15.7)	0.009 *** (5.20)	-0.049 *** (-16.5)
沿海地区			0.023 *** (9.96)	0.044 *** (10.6)	0.026 *** (11.8)	0.030 *** (7.90)	0.027 *** (12.0)	0.029 *** (7.38)
北京、天津、上海			0.078 *** (8.30)	0.067 *** (3.75)	0.100 *** (10.6)	0.022 (1.30)	0.095 *** (10.0)	0.026 (1.59)
城市距离指数					-0.013 *** (-11.8)	0.035 *** (15.9)	-0.016 *** (-12.5)	0.032 *** (14.6)
初中教育(%)					0.001 *** (8.84)	0.003 *** (13.9)	0.0007 *** (4.89)	0.0034 *** (13.7)
地-劳动比对数							0.001 (0.52)	-0.015 *** (-5.99)
加权 R-squares		0.006		0.068		0.198		0.217

方程(1)表明, 1985 年初始人均农业产值对于农业增长率具有负作用, 表示绝对趋同。方程(2)表示, 1985 年人均非农业产值对非农业增长率具有正作用, 表示发散。因此, 对农业生产来说, 初始落后县以很快的增长速度追赶着初始发达县; 对于非农业生产来说, 富裕县可能更加富裕。

方程(3)和(4)表明, 在把沿海地区以及三个直辖市与内陆省份区分开的情况下, 农业和非农业生产都呈现趋同性增长趋势, 但非农业生产的趋同性在统计上不显著。沿海和大城市的系数显著, 表示这些地区的生长快于内地。与翦天伦、萨克斯和瓦尔纳的分析相一致, 农业生产在 80 年代有趋同性趋势, 我相信 90 年代也是如此。但与他们的分析相反, 农村非农业产业不仅在沿海与内陆地区之间是发散的, 在它们内部也是发散的。^①

方程(5)和(6)包括了城市距离和教育。首先, 这两个因素的存在导致了非农业生产的显著性极强的趋同趋势。通过控制城市距离和教育两个变量, 1985 年人均非农业产值的回归系数从 -0.0002 变到 -0.0043, 增长 20 倍。很明显, 城市经济溢出和人力资本是非农业部门趋同性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如果保持城市距离、教育和沿海区域几个变量不变, 总趋同的半周

① 这里的结论不足以反驳翦天伦、萨克斯和瓦尔纳(1996)关于沿海地区内部和内陆地区内部趋同性的研究结论。他们的分析以包括城市产值、农业产值和农村非农业产值的省的人均 GDP 为基础。但我的分析揭示了那种忽视城—乡二元结构和农业—非农业二元结构的区域差异理论的局限性。

期只是 13—14 年。^① 一般而言, 边远贫困县的农村工业很难起飞, 更谈不上赶超。但如果距城市的距离相同(即获得相同的近水楼台效果)和人力资本相同, 工业后起步的县可以在短时间里赶上相对发达的县。

第二, 城市距离对农业和非农业增长率的作用是相反的。保持其他因素不变, 城市距离对非农业增长率的影响是正的, 而对农业增长率的影响是负的。非农业活动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城市经济的溢出, 这一结论与帕金斯(1990)和诺顿(1995b)的观察是一致的, 即乡村企业增长是城市扩张过程的一部分。城市距离指数的一个标准差可使非农业增长率至少增加 3.5 个百分点。^② 另一方面, 城市扩张因增加了土地的市场价格和劳动的机会成本, 从而挤压了农村部门的扩张机会。城市距离指数的一个标准差降低农业增长率约 1—2 个百分点。

第三, 人力资本对非农业增长率的影响明显大于对农业增长率的影响。初中教育的比例每增长 10%, 会导致非农业增长率产生增量 3 个百分点以上, 见方程(6), 但只导致农业增长率发生约一个百分点的增量, 见方程(5)。

方程(7)和(8)考察了农业生产与非农业生产之间的相互作用。尽管有许多怀疑, 农业和非农业生产之间仍似乎存在互利关系。滞后的(1985)农业产出对非农业增长率有较大影响, 证明农业积累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启动资金和产品市场。另一方面, 滞后的非农业产出对于农业增长率的影响尽管较小, 但统计显示, 反映了以工补农的积极作用。因为农业投资的利润水平远比非农业投资的利润水平低, 非农产业利润转为农业投资便受到阻滞, 而由农业到非农业的资本转移则大大加强。由此自然容易理解, 滞后的农业产出对非农业增长的影响远远超过滞后的非农业产出对农业增长的影响。

农业发达县的非农业增长也快这个事实暗示着非农业发展的差异强化而不是缓减农业发展的差异。这个事实还说明, 人们观察到的乡村企业对农业的不利影响可能反映了城市距离所产生的一种虚假联系: 城市经济溢出使乡镇企业围绕城市而发展, 但城市扩张提高了土地的市场价格, 并给农民提供进城就业的机会, 从而抑制了农业的发展。换句话说, 农业生产在城市郊区的衰落, 不是因为乡镇企业的发展, 而是因为城市扩张。

土地与劳动力之比对非农业活动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见方程(8)、表 2, 这与何(Ho, 1994)的观察一致, 即土地短缺和劳动力过剩推动了中国乡村工业化。土地广袤会产生较强的农业, 但似乎于农业增长率无益, 这也许反映 80 年代后期农业增长主要依赖多种经营和非种植业发展。土地与劳动力之比对非农业增长率的负面影响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土地肥沃的中国东北各省, 尤其是黑龙江省, 乡镇企业发展缓慢。

① -0.043 的回归系数导出年均 β 趋同率为 5%。总趋同的半周期借助下面的公式计算:

$$(1-\beta)^N = 1/2$$

因此, $N = \ln(1/2)/\ln(0.095) = 13.5$

② 由于因变量是对数增长指数而不是增长率, 所以回归系数可被解释为增长指数的增长百分点。设 π 为非农业增长率且较小 U 为城市邻近指数, 则有:

$$\frac{\partial \ln(1+\pi)}{\partial U} = \frac{\partial \pi}{(1+\pi)\partial U} = 0.035$$

or $\frac{\partial \pi}{\partial U} = 0.035(1+\pi) \approx 0.035$.

分解基尼系数

增长模型中的 β -趋同通常可导致横向差距的缩小,但并不绝对。因此直接分析区域差异指标是必要的。本文计算基尼系数,因为根据勒尔曼和逸晴(Lerman and Yitzhaki, 1985; 亦见 Rozelle, 1994)提供的方法,基尼系数是可以分解的。假设 Y 是 K 个分量的总和, Y_K 为第 K 个分量,则 Y 的基尼系数可以用下列方法进行分解:

$$G = \sum_{k=1}^K [\text{cov}(Y_k, F) / \text{cov}(Y_k, F_k)] \cdot [2\text{cov}(Y_k, F_k) / M_k] \cdot [M_k / M] = \sum_{k=1}^K R_k G_k S_k, \quad (2)$$

公式中 F 和 F_k (值域从0到1)为总收入的累计分布(即它的秩)和某个 K 分量的累计分布。 M 和 M_k 是中数。 R_k 是总量与 K 分量之间的“基尼相关系数”。 G_k 是 K 分量的基尼系数。 S_k 则是某个 K 分量占总量的份额。每个分量对总基尼系数的影响不仅决定于它自己的基尼系数,还决定于它在总量中所占份额以及它与总量的关系。这样,总的基尼系数便可以看作是各分量基尼系数的加权平均值,而权数为各分量的份额及其基尼相关系数。

我们现在考察的农村产值仅仅包括两个分量:农业产值和非农业产值。表2列出了1985、1987、1989和1991年中国县级人均产值的基尼系数及其分解。让我们先考察各分量对总基尼系数的作用强度。

表2 中国县未加权基尼系数以及分解 (N=1883)

		1985	1987	1989	1991
人均农业总产值	Gini coefficient	0.211	0.260	0.256	0.253
	Gini correlation	0.854	0.859	0.828	0.794
	Share of mean	62%	57%	52%	49%
	Share of total Gini	37%	37%	31%	26%
人均非农业总产值	Gini coefficient	0.532	0.535	0.549	0.575
	Gini correlation	0.927	0.929	0.943	0.950
	Share of mean	38%	43%	48%	51%
	Share of total Gini	63%	63%	69%	74%
人均农村社会总产值	Total Gini	0.300	0.341	0.360	0.378

由表2可以看出,人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基尼系数在1985—1991年间由0.300上升到0.378,此期间非农业的贡献由63%上升到74%。人均非农业产值的基尼系数始终超过人均农业产值基尼系数的两倍。1985—1991年间总产值中非农业产值的份额由38%增长到51%。因基尼相关系数相对稳定,非农业产值份额增大导致总基尼系数增长。

表2中基尼系数的时间变化趋势可以在图2中得到更清楚的反映。可能由于多种经营向非农产业方向发展,农业基尼系数从1985年到1987年有所增长,然后开始下降,基本与前面的增长分析所确定的农业产值趋同性结论相一致。在7年里,非农业基尼系数由0.532增长到0.575,也与前面的增长分析确定的非农业产值非趋同性结论相一致。两个分量加权平均所确定的总基尼系数在1985—1991年间呈稳定趋势。

总结与结论

二元经济结构对于理解区域差别十分重要,库兹涅茨曲线也以此为出发点。80年代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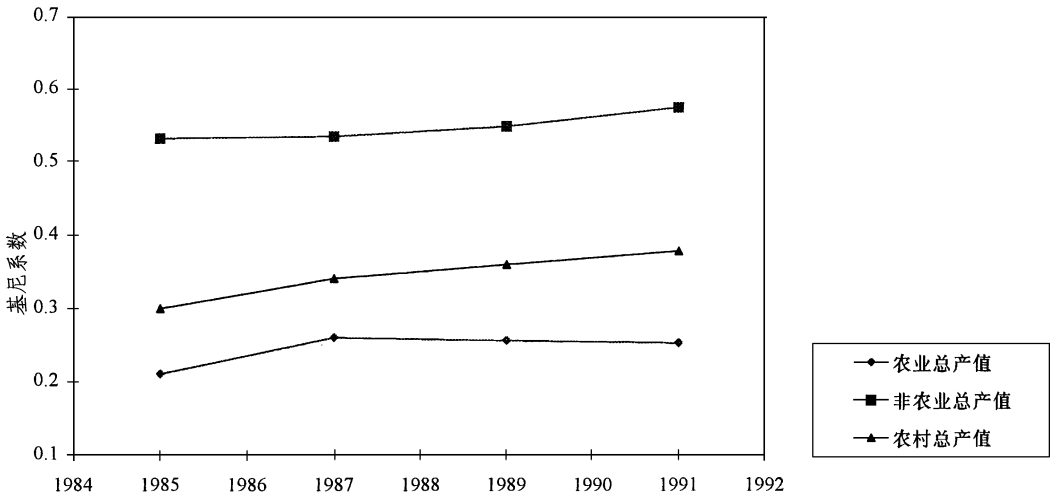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农村各县人均基尼系数分解 N = 1883

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其二元结构表现为制度化的城乡差别，壁垒分明。1978 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充满活力的非农业部门开始与传统农业部门分道扬镳，并产生了农村的二元经济。与传统农业部门不同，以乡镇企业为主的非农业部门与城市经济密切相关，并因此被赋予明显不同于农业部门的增长机制。

本文证明了农业部门的绝对趋同趋势和非农业部门的发散趋势。由城市经济溢出（辐射）推动非农业部门增长但却与农业增长无关这个事实揭示了两部门增长的不同动因。乡镇企业环绕城市发展得益于城市技术溢出和城市的扩张。教育因提高技术吸纳能力而加速了非农业增长。在地理位置和人力资本禀赋相同的条件下，非农业部门增长是趋同的，即落后县有赶上先进县的趋势。但大城市的郊区县比偏远县在乡镇企业发展上占绝对优势。

新增长理论强调，如果增长过程包含知识溢出和人力资本的作用，投资回报不一定是递减的。中国乡村工业化受到城市知识溢出和教育的推动，因此显示非趋同性增长。聚集经济似乎适用于环绕城市的乡镇企业的增长。

与增长分析一致，农村基尼系数的分解显示，非农业基尼系数在 1985—1991 年间稳定增长，同时，农业基尼系数尽管很小却趋于稳定。因为非农业产值比重增长迅速，农村总基尼系数持续增长。虽然本文资料的时间段有限，我估计农村基尼系数至少在短时期里会继续上升，仅就非农业部门在 90 年代的快速增长也会导致这个结果。但我不造成套用库兹涅茨所赞成的倒 U 型曲线来描述农村发展道路，也不会将日益扩大的农村区域差异推及太远的未来，因为非农业部门的长期增长趋势可能发生变化。乡镇企业正在迅速更新技术，城市技术的优势并不能永远维持。增长使中国经济在 90 年代脱离国家计划，国有企业在所有权改革中步履蹒跚，笼罩在破产的阴影之下。这种情形一方面加速了技术由国有企业向乡镇企业的流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国有工业部门在迅速丧失它相对于乡村工业的技术优势。随着技术差别的日益缩小，乡村非农业部门将可能产生新的增长机制。外部因素也将可能发生作用，例如人口迁移的制度性障碍（户口制度）将完全被取消，这将影响资本与劳动要素的区域分布，并最终缩小地区差异。

黄宗智(Huang, 1990)指出, 中国近年的乡村工业化为实现真正的结构性转变创造了一种可能性。这项研究的资料说明, 那些距离城市最近的地区会率先实现结构转变, 而广大乡村地区将继续以农业为本。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享有高水平的城市化和充裕的人力资本供应, 因此, 这些地区的乡镇企业将进一步发展, 并使沿海与内地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这些分析证明, 乡村工业向内陆落后地区的扩散如果可能的话, 其过程也将十分缓慢。

参考文献:

-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1993, *China's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Rural Banking 1993* (Zhongguo Nongcun Jinrong Tunji Nianjian), Beijing: China Statistical Publishing House.
- Anderson, Dennis, and Leiserson, Mark W., 1980 "Rural nonfarm 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8: 227—248.
- Barro, Robert J., and Xavier Sala-i-Martin., 1995,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 Becker, Gary S., 1964, *Human Capital*,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lank Grant, and William Parish., 1990, "Rural Industry and NonFarm Employment," pp. 109—139 in *Chinese Urban Reform*, Reginald Kwok, William L. Parish, and Anthony Yeh, eds. Armonk, N. Y.: M. E. Sharpe.
- Byrd, William A. and Alan Gelb., 1990 "Why industrialize? The incentives for rural community government," pp. 358—387 in *China's Rural Industry: 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edited by William A. Byrd and Lin Qingso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i, Fang, 1994 "Nongcun fazhan bu pingheng de shizheng fenxi he zhanlue sikao" (Strategic Reflec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Uneven Rural Development), *Nongcun Jingji yu Shehui*, 1994(3): 7—15.
- Chen, Chao, and Wang Xiguang, 1991, *Zhonggou Xianshi Zhengqu Ziliao Shouce* (A Handbook of Chinese County and City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Beijing: Ditu Chubanshe.
- Chen, Jian, and Belton M. Fleisher., 1996 "Regional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2: 141—164.
- Cheng, Tiejun and Mark Selden., 1994 "The Origin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hina's Hukou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644—68 (1994).
- China Labour Statistical Yearbook, 1997, Compiled by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and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PRC), Beijing: China Statistical Publishing House.
- China TVE Yearbook,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Zhongguo Xiangzhen Qiye Nianjian*, Beijing: Zhongguo Nongye Chubanshe.
- Fan, C. Cindy., 1992 "Regional Impacts of Foreign Trade in China 1984—1989," *Growth and Change* (Spring): 129—159.
- Fei, Hsiao-t'ung, 1989,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Prospect and Retrospe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elb, Alan, 1990, "TVE Workers' Income, Incentives and Attitudes," pp. 280—98 in *China's Rural Industry: 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edited by William A. Byrd and Lin Qings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 Samuel P. S., 1994 *Rural China in Transition: Non-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Rural Jiangsu, 1978—199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Jikun, and Scott Rozelle., 1996, "Technological Change, Rediscovering the Engine of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a's Rural Econom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49: 337—369.
- Huang, Philip C. C., 1990,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Delta, 1350—1988*, Stan-

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Jian, Tianlun, Jeffrey D. Sachs and Andrew M. Warner., 1996, "Trends in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7: 1—21.
- Kuznets Simon, 1955,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 1—28.
- Knight, John, and Lina Song, 1993, "The Spatial Contribution to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7: 159—213.
- Lerman, Robert L. and Shlomo Yitzhaki, 1985, "Income Inequality Effects by Income Source: A New Approach and Applications to the United Stat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7(1): 151—156.
- Li Peilin, and Wang Chunguang, 1993, *Xin Shehui Jeigou de Shengzhang Dian* (*The Growth Point of a New Social Structure*), Jinan, China; Shangdong Renmin Chubanshe.
- Lin, Justin Y., 1992, "Rural reform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2, No. 1.
- Lin, Justin Y., Fang Cai, and Zhou Li, 1996, *The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s 5—6.
- Lu, Xueyi, 1995, "Rethinking the Chinese peasantry: Ten Years of Transformation,"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28(1): 39—80.
- . 1993, "The Use of Chinese Rural Labour Resources and its Impact on the Rural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8: 227—37.
- Ministry of Civil Administration, PRC., 1992,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Counties*, Vol. 1—6. Beijing, Shehui Chubanshe.
- Naughton, Barry, 1995a,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95b, "Cities in the Chinese economic system: changing roles and conditions for autonomy," pp. 61—89 in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edited by D. S. Davis, R. Kraus, B. Naughton, and E. Per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ee, Victor, 1986, "The Peasant Household Economy and Decollectiviz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XXI 185—203.
- . 1992,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f Market Transition: Hybrid Forms, Property Rights, and Mixed Economy in China,"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7: 1—27.
- . 1996, "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908—49.
- Nee, Victor, and Sijin Su, 1996, "Institutions, Social Ties, and Commitment in China's Corporatist Transformation," pp. 111—134 in *Reforming Asian Socialism: The Growth of Market Institutions*, edited by John Mcmillan and Barry Naught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Nielsen, Francois, 1994, "Income Inequalit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ualism Revisite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 654—677.
- Nielsen, Francois and Arthur S. Alderson, 1995, "Income Inequality, Development, and Dualism: Results from an Unbalanced Cross-National Panel,"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674—701.
- O, Jean C., 1989,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Orleans, Leo A., 1992, "Loss and Misuse of China's Cultivated Land," pp. 403—17 in *China's Economic Dilemmas in the 1990s*, edited by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 E. Sharpe.
- Peng, Yuan, 1995, "Capital Formation in Rural Enterprises," pp. 93—116 in *Rural Enterprises in China*, edited by

- C. Findlay, A. Watson, and H. X. Wu,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Peng Yusheng, 1992, "Wage determination in rural and urban China: A comparis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industrial sector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198—213.
- Peng Yusheng, Lynne Zucker, and Michael Darby, 1997, "Chinese Rural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and Urban Spillovers" NBER Working Paper 6202,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 Perkins, Dwight, 1990,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Reforms on China's Urbanization," pp. 78—106 in *Chinese Urban Reform*. Reginald Kwok, William L. Parish, and Anthony Yed eds Armonk, N. Y.: M. E. Sharpe.
- Qiu, Haixiong, 1997, "Guoyou qiye zuzhi jigou gaige de guocheng, yuanyi he jieguo" (The process, reasons and results of the organizational reform in state-owned firms), *Shehuixue Yanjin* 1997, No. 2: 41—49.
- Robinson, Arthur H., Joel L. Morrison, Phillip C. Muehrcke, A Jon Kimberling, and Stephen C. Guptill, 1995, *Elements of Cartograph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 Romer, Paul M.,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4: 1002—37.
- Rozelle, Scott, 1994,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creasing Inequality: Emerging Patterns in China's Reforming Econom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 362—391.
- Sengupta, Jati K., and Bo Q. Lin., 1993, "Recent Rural Growth in China: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ural Small-Scale Enterprises 1980—86,"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7: 177—96.
- Sicular, Terry, 1992, "China's Agricultural Policy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 pp. 340—64 in *China's Economic Dilemmas in the 1990s*, edited by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 E. Sharpe.
- Solinger, Dorothy J., 1995,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cities, chances for assimilation? pp. 113—139 in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edited by D. S. Davis, R. Kraus, B. Naughton, and E. Per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ark, David, 1996, "Recombinant Property in East European Capit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993—1027.
-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PRC, 1989, *Zhongguo Fenxian Nongcun Jingji Tongji Gaiyao 1980—87* (Summary Statistics of Rural Economy of Chinese Counties 1980—87), Beijing: China Statistical Publishing House.
- 1991, *Zhongguo Fenxian Nongcun Jingji Tongji Gaiyao 1989* (Summary Statistics of Rural Economy of Chinese Counties 1989), Beijing: China Statistical Publishing House.
- 1992,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ese Cities*, Vol. 1992, Beijing: China Statistical Publishing House.
- 1993, *Zhongguo Fenxian Nongcun Jingji Tongji Gaiyao 1991* (Summary Statistics of Rural Economy of Chinese Counties 1991), Beijing: China Statistical Publishing House.
- 1996,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1996*, Beijing: China Statistical Publishing House.
- 1997, *Rural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a 1997*, Beijing: China Statistical Publishing House.
- Steward, John Q., and William Warntz, 1985, "Macrogeography and Social Science," *The Geographic Review*, 48 (2): 165—184.
- Tsui, Kai-Yuen, 1993, "Decomposition of China's Regional Inequaliti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7: 600—627.
- Walder, Andrew G., 1995,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263—301.
- Wang, Hansheng, Weimin Cheng, Xiaofeng Yan, and Weiming Yang, 1995,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 differentiation: Changes in rural social structure in China since the reform,"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28(1): 9—37.

- Wang, Xiaolu, 1990, "Capital formation and Utilization," pp. 222—242 in *China's Rural Industry: 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edited by William A. Byrd and Lin Qingso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on, Jeffrey G., 1965,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 Description of the Patter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XIII(4) Part II.
- Wong, Christine P. W., 1988 "Interpreting Rural Industrial Growth in the Post-Mao Period," *Modern China*, 14: 3—30.
- Wu, W. Harry, 1994, "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669—98(1994).
- Yang, Dalí and Wei, Houkai, 1996 "Rural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Policy in China" *Asian Perspective*, 35(1).
- Zhang, Shiwen, 1991(1936), *Din xian Nongcun Gongye Diaocha (An Investig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in Ding County)*, Sichuan: Sichuan Minzhu Chubanshe.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张志敏

社会知识：传承，挑战和展望

第 14 届世界社会学大会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于 1998 年 7 月 26 日—8 月 1 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召开。来自世界 100 多个国家的 4132 名社会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参加了大会。我国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周长城和上海社会科学院苏颂兴等应邀参加。

大会的主题是“社会知识：传承，挑战与展望” (Social Knowledge: Heritage, Challenges, Perspectives)。各国社会学家在 1000 个分会中宣读了 5000 多篇论文。其中最为热门的论题是全球化对个人和国家的经济影响，种族问题以及工作和闲暇时间问题也是热点话题。

今年适逢国际社会学协会成立 50 周年，大会为此专门组织了三个论坛，一是庆祝国际社会学协会成立 50 周年国际社会学协会第 14 届主席、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的讲话；二是关于“社会科学与语言文化的多重性”的圆桌论坛；三是关于“二十一世纪社会科学的将来”的圆桌论坛。

最后，大会选举了意大利著名经济社会学家马蒂尔利 (Alberto Martinelli) 为国际社会学协会第 15 届主席，决定 2002 年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召开第 15 届世界社会学大会。

(周长城)